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 of the Anti-dogmatism Movement in the PLA 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1950's

## 20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 反“教条主义”斗争原因及影响解析

□ 潘 宏

**摘要:** 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要求在全军认真展开反“教条主义”斗争。会议所做的关于反“教条主义”的决议,使人民解放军在学习苏军建军经验过程中出现的意见分歧,没有沿着“在学习方法”、“思想工作方法”上查找问题,而是结合当时不断被烘托的政治气氛,上升到方向性、路线性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本文以史实为依据,详尽分析了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的主要原因,并对其产生的严重影响进行剖析。

**关键词:** 新中国军事史 反教条主义 原因及影响 解析

**中图分类号:** E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83-(2012)02-0030-04

新中国成立后,为使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较高的起点,人民解放军遂开展学习苏联军队先进经验的活动。但在学习苏联建军经验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这些偏差成为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的缘起。重温这段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

### 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与关于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的决定

1958年5月27日~7月2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各军区、各军兵种领导干部共365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邓小平、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在会上讲话。这次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8年来军队建设工作。国防部长彭德怀宣布会议的两项主要内容,即整风和整编,主要解决人民解放军建军原则、建军方针、战略方针三个问题,方法是大鸣大放、大争辩。但是,这些预设问题并没有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而是由此开始了全军范围内的反“教条主义”斗争。

5月24日,军委扩大会议动员会先行召开。会上,彭德怀指出会议主题是整风和整编两大问题。军委扩大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一位海军代表给会议主席团写了一封近2000字的长信,表达自己的想法。毛泽东对该信很重视,做了200余字的批示。毛泽东还在信中说:“在我看来,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还写下旁批:“不存在问题么?”同时,毛泽东还在信中关于学习苏军问题做出批示:“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来说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毛泽东指出“有些同志对会议的开法有些不满。此事容易,调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气,大有可为”<sup>①</sup>。为此,他专门责成邓小平“帮助德怀同志将军委会议开好”。不难发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明确意向,已将反“教条主义”列为此次扩大会议的议题。在整个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共做了3次讲话。时间分别在6月21、23、29日。6月21日,毛泽东给军委扩

<sup>①</sup>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348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大会议全体与会者讲话,详细讲述了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6月23日,毛泽东又在中海游泳池召集军委委员和各组组长座谈阐明观点:坚决反对“教条主义”。29日,毛泽东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对会议作了评价。他认为这次会议开得不错,通过“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大鸣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经验教训,教育和团结了全党全军。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3次讲话有着特殊意义。首先,由于毛泽东的威望,其讲话具有定性的意味。其次,毛泽东的讲话由面至点地批评,包含追究个人责任的意味。第三,毛泽东联系当时“大跃进”的形势,对军队工作表示不满,使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等人感到压力很大。毛泽东的讲话使会议骤然升温,并在政治方向上发生偏转。

在军委扩大会议主题发生改变后,彭德怀作为会议主持人十分被动。《黄克诚自述》载: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sup>①</sup>军委扩大会议以1958年6月9日为分界点,前后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彭德怀进行必要的动员,主题是有关整风和整编兼或提及教条主义问题。第二阶段:毛泽东主张军委扩大会议增加出席人员,范围扩大到师党委书记,新增640人,使到会人员增加到1004人,列席会议由25人增加到438人。会议的主题转到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此后,会议以毛泽东讲话为基调,对负责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刘伯承、萧克、李达等进行点名批判。刘伯承、萧克和其他被认为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人,在7月9日和10日大会上被迫进行检讨,批判性发言持续到15日。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及部分与会人员等,纷纷在不同场合表态以示思想转变。7月19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做总结发言。7月22日,大会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草案)》。决议指出:

“在某些部门和某些单位,主要是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现在我军中存在的错误倾向,基本上是我军历史上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斗争在新的条

件下的反映”,“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决议要求:“目前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展开”<sup>②</sup>。彭德怀在闭幕式上讲话,希望“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在现有的基础上将有一个大跃进”。<sup>③</sup>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反“教条主义”做出的错误结论,使人民解放军在学习苏联建军经验过程中出现意见分歧时,没有沿着“在学习方法”、“思想工作方法”上查找问题,而是结合当时不断被烘托的政治气氛,上升到方向性、路线性的大是大非问题上。

## 二、1958年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的原因分析

人民解放军在学习苏军先进经验的过程中,产生机械照搬等偏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从人民解放军的角度分析。首先,当时使用的苏军教令、教材以及一些现代化的作战原则是以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军事科学,包含先进的军事技术和丰富的现代作战经验。人民解放军由于刚刚从战争中走来,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将血与火的战争经验梳理成理论文字,而且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将苏军的经验加以研讨和变通,无法采取批判的态度学习苏联军事科学,故在工作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这是客观不得已的选择。其次,出于对苏军先进经验的迫切需求,中央军委一些同志确曾提出诸如“不走样地学”、“高学低用”、“死学活用”、“先学后用”等不适当的口号。这些口号及简单的思想工作方法,使人民解放军在贯彻学习苏军先进经验过程中,缺乏主动思考精神,因而产生了生吞活剥、囫圇吞枣现象。

第二,从新中国国际环境分析。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在国内推行全面否定斯大林政治路线,并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政党之间,极

① 《黄克诚自述》,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349页。

③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31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力推行领导与被领导、控制与被控制政策,引起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的不满。苏共“二十大”引起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极大震动,同时也引起社会主义国家思想上的极大混乱。50年代后期,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极力推行与美国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和平共处总路线”,不惜牺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强硬做法,加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离心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运行轨迹的变化,使社会主义新中国对赫鲁晓夫执政的苏联产生距离感,并开始不断地检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联系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曾经有过的危害,更加重了两国意识形态和发展方向的背离。从某种程度讲,苏联的政治变化作为外因,对人民解放军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具有重要影响。

第三,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层面分析。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存在误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已发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诸多弊端,也试图避免走苏联的弯路。但是,从中国对苏共“二十大”的表态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与检讨,并不是从社会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入手,而是从思想及工作方法亦即从意识形态领域作为楔入点。毛泽东选择在苏共“二十大”两个月后,发表《论十大关系》,意在总结经验,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关系;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系统论证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与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其总的精神就是要用民主的原则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避免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的积累。这无疑都是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积极做法。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无论如何也不能归结为思想及领导方法方面的失误,因为这种分析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是单一公有制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领导体制矛盾的必然结果。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代的否定,并不能改变这种体制对苏联政治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进行重

塑。任何在意识形态领域查找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做法都会有所得,但也都不会抓住问题症结的根本所在。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一直从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两个方面观察国内政治形势和思想动向。基于此,毛泽东虽然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已开始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题,但也同时认为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而且认为这种矛盾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正是由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总结得不深刻,才使新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根本问题的分析产生失误,导致1957年整风运动在开展不到半个月即发生转向,使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甚至改变了中共“八大”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由此造成“阶级斗争理论”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地被应用和发展。

第四,从党内处理不同意见的方法上分析。由苏共“二十大”引发的新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具有积极意义,但这种急煞车式的调整失误的做法极易造成一种错觉,即似乎学习苏联建军经验是错误的。另外,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对学习苏军活动中出现的偏差一开始即冠以“主义”式的错误定性,并以整风学习文件规格及形式提请全军注意,极易引起思想混乱,使人不自觉地此次“教条主义”错误与历史上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联系起来。这种模糊不清的反“教条主义”概念,极易诱使人们采取解决“主义”之争的办法,即展开路线斗争。事实证明,事态的发展正是沿着这种思维惯性展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在对所谓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批判的同时,严重追究个人责任,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大批判。刘伯承在病休期间被召回北京,一下火车就被送入大会会场作检查。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进行申辩,结果被当场摘掉帽徽领章,连哄带扭赶出会场关押起来。这种因袭战争年代政治斗争的方法,严重损害了党和军队的民主政治建设。

### 三、对1958年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影响的思考

第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把思想工作方法

问题看成是军事路线之争，并引入军队高级领导层，产生了严重影响。“反教条主义”与反“教条主义”斗争有着政治意义上的严格区别。教条主义属于工作上、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中央提出克服学习苏联经验中的教条主义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作为“中央军委集体决定”，把学习苏军过程中出现在军队管理、军事训练、院校教育中的偏差，说成是“教条主义”，把局部出现的偏差，夸大为全军性的系统错误，把本属于思想认识、工作方法上的分歧夸大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是完全错误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对形势的估计，从政治背景和整个社会效果来看，是50年代后期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解决军内矛盾的首次实践，是把党内有关方针政策不同意见的正常讨论，当作两大阶级生死对抗来看待和处理的首次预演。这种以路线斗争定性作为最终解决党内及军内不同意见的方法，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军队的民主政治建设，严重干扰了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第二，反“教条主义”斗争严重背离了纠正学习苏联经验偏差的初衷，影响了借鉴外军经验加速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批判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学习。但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反“教条主义”斗争的开展却违背了这一原则。根据1958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精神，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举行两院党委联席扩大会议，对刘伯承、陈伯钧、宋时轮等进行揭发批判。会议对南京军事学院的结论是：南京军事学院成立以来所犯的错误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错误。“这条错误路线在长时间内和中央军委正确路线相对抗，是我军历史上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条错误路线统治学院数年之久，在军事训练和科学研究中表现最为严重，其影响遍及全军，其发展过程是由盲目到自觉，由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发展到路线错误”。军委扩大会议后开展了对以往倡导学习苏军经验同志的错误批判，全军开始深刻地检讨、批判甚至完全否定过去学习苏军经验所取得的成绩，致使人民解放军借鉴外国建军经验的

工作基本上停顿下来。军队的训练和院校教育机构成为整治重点。此后，为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而进行的人才培养受阻，学习外军经验的大门也在斗争和批判中长期关闭了。

第三，错误地批判处理在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部门工作的同志，极大地挫伤了主管军队教育训练工作的同志投身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鉴于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点名批评，刘伯承主动辞去军事学院院长职务。与刘伯承一同受到组织处理的还有许多干部。粟裕被免除总参谋长职务，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萧克、李达被免除国防部副部长职务，调出军队，分别担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和国家体委副主任；另有一大批受到牵连的干部被处分和处理。由于反“教条主义”斗争的开展，全军各级主管训练工作的干部和院校工作的干部，大部分受到错误批判。院校教员特别是教研室主任一级的干部，多被指为“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而调离院校，改行做其他工作或做转业处理。这些做法严重打击了为部队现代化建设刻苦工作的干部的积极性，使他们长期不敢抓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不敢提学习外国经验，不敢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刚刚起步的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由此失去了活力。

第四，政治批判的浓烈气氛严重地破坏了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作风建设。毛泽东在1957年成都会议上，确定了要以地方促军队，在军队中进行整改的决定。1958年6月18日，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会议传达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关于军队整改的意见。毛泽东的讲话，表现出的对新中国成立后几年来军队建设工作的严重不满，自然引起军委的高度重视，致使军委一些领导同志放弃了对军队实际状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被动顺从毛泽东的思路，并对人民解放军建设状况进行严厉的批判，也使这场错误运动得以漫延开来。

作者：潘宏，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出版社副编审

责任编辑：田越英